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

蘇 輝／著

秦、三晉紀年兵器是戰國金文中數量較大的一批材料，銘文包括年數、鑄地、督造者、主造者和鑄造者的官稱與名字，以及置用地點、器物編號等信息，對於考察當時“物勒工名”制度，以及軍械鑄造、收藏、管理和流程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書運用多學科方法，從辭銘格式、文字考釋、歷史地理三個方面展開，修正了前人兵器分國的疏失，使一些器物的國別得以澄清，同時解決了相關器物的歸屬問題。此外，本書分別探討了四國兵器銘文中反映的年代、史實和制度等問題，綜合各方面的特徵因素，推求各器的演變規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李學勤 主編

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

蘇 輝／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 / 蘇輝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0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 李學勤主編)
ISBN 978-7-5325-7022-5

I. ①秦… II. ①蘇… III. ①兵器(考古)—研究—山西—先秦時代 IV. ①K875.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25449 號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

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

蘇輝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19 插頁 4 字數 311,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7022-5

K · 1784 定價: 5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承印公司調換

本書獻給我的父親母親！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09JZD0042）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10&ZD091）

叢書前言

“出土文獻”是與“傳世文獻”相對的概念，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簡牘帛書等。出土文獻的整理研究始於漢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裏，出土文獻層見疊出，研究工作不斷走向深入。孔壁中經、汲冢竹書、商周金文、殷墟甲骨……每一次重大的發現，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那個時代的學術生態。

1925年，清華研究院的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首倡“二重證據法”，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他所謂的“紙上之材料”即傳世文獻，“地下之材料”就是出土文獻。通過出土文獻來印證補正傳世文獻，開闢研究中國古史的新途徑，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真諦。“二重證據法”是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革新，對近代學術的影響至為深遠。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時期的竹簡，總數約2500枚，其中有多種經、史典籍，非常珍貴，其重要性堪與孔壁中經、汲冢竹書相媲美。9月，清華大學成立了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心的定位是：通過開展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交叉性和合作性研究，深入探討出土文獻的保護、整理、研究的前沿課題，把中心建設成為具有世界領先水準的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當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對清華簡進行保護、整理與研究，同時開展其他出土文獻的保護和研究工作。中心自成立以來，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別是在清華簡的保護、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學術界及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

2011年4月，在清華百年校慶前夕，中心領銜申報的“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2012年5月，為回應教育部2011計劃，中心聯合國內11家兄弟單位組織籌建“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2013年1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

在短短的五年內，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經歷了跨越式的發展，在領導的關懷支持和同人的集體努力下，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處仍然是明顯的。我們的學識經驗都很有限，面對任務的要求，時時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我們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教。

不管中心如何發展，我們始終圍繞着“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這個主旋律。

為了集中展示近年來出土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推進出土文獻的研究工作，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輯了這套“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叢書”。叢書將陸續推出，作者包括中心和其他單位人員，都是活躍於一線的中青年學者，所涉及的出土文獻時間跨度很大，所涉及的學科領域相當寬廣，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當今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面貌，相信廣大讀者能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這套叢書的編輯，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積極回應，更有幸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李學勤

2013年10月

目 錄

緒 論	1
第一章 兵器的考古類型學研究	5
第一節 《集成》兵器銘文獻疑	5
第二節 秦三晉紀年銅戈的類型	10
第三節 秦三晉紀年兵器的刻銘與行款類型	20
第二章 三晉紀年兵器分國試論	30
第一節 分國依據辨析	31
第二節 分國應用實例：相邦瘡戈國別的推定	40
第三節 國別未定兵器列表	46
第三章 趙國紀年兵器研究	49
第一節 惠文王時期的兵器	49
第二節 孝成王及以後的兵器	61
第三節 趙國兵器編年表	76
第四章 魏國紀年兵器研究	81
第一節 魏器辭例演變	81
第二節 魏國紀年兵器銘文的發軔期	94
第三節 元年閏再十二月矛	105
第四節 清華簡《繫年》少鄂與 _𠄎 (_𠄎)地三戈	112
第五節 魏國兵器編年表	122

第五章 韓國紀年兵器研究·····	126
第一節 白廟范村窖藏兵器的調查及新器彙錄·····	126
第二節 宜陽四器的特殊辭例與十一年令少曲慎戈·····	138
第三節 韓器斷代講疏·····	144
第四節 韓國兵器編年表·····	155
第六章 秦紀年兵器研究·····	161
第一節 前人研究概述·····	161
第二節 以上郡製造的兵器為中心的討論·····	162
第三節 其他地方與機構製造的兵器·····	182
第四節 秦國兵器編年表·····	194
第七章 兵器銘文與戰國後期趙國政局新識·····	202
第八章 傳世兵器、藏家與學術史	
——傳統金石學視野中的三晉兵器一例·····	216
第九章 秦三晉紀年兵器的重要價值·····	227
附錄一 秦三晉紀年兵器鑄地分佈圖·····	241
附錄二 稀見紀年兵器選圖·····	242
附錄三 兵器銘文上的戰國名將廉頗·····	260
附錄四 關邑家壺釋論·····	264
附錄五 陳簠齋舊藏莽量的重新發現與研究·····	273
附錄六 巨匠規矩 金針度人	
——在李學勤先生指導下做碩士論文的點滴·····	282
參考書目·····	287
引書、文簡稱表·····	294
後 記·····	296

緒 論

一、研究對象

本書研究的對象是秦、三晉紀年兵器。三晉指韓、趙、魏，由於均是從春秋晉國析出，三晉在國家結構、行政制度、社會習俗、文化面貌尤其是文字等方面有一致性。但隨着時代的變遷、對外交流的擴大和各國形勢的發展，三晉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在上述的各個層面均有了較大的改觀。至戰國晚期，從同一源頭分化出來的韓、趙、魏三國也在與時俱進中形成了自身的特點，表現在制度和器物的方方面面。辨析其中的異同會增進對相關史實的認識。戰國時代秦國與三晉在兵器鑄造制度上有較多的相似性，故統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四國紀年兵器目前數量總共在400件左右。

二、依據的材料

在1949年以前，收錄三晉銅器銘文最為宏富的是《三代吉金文存》，隨着《金文總集》和《殷周金文集成》（下文簡稱《集成》）的陸續出版，尤其是後者，已經成為學者查詢、引用先秦金文的首選，基本上將傳世的三晉金文材料網羅殆盡。《集成》收集材料的下限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學者又編輯了最新的金文材料集，以接續《集成》的規模。其中參加過《集成》項目的劉雨先生就分別主持編有《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及《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二編》（中華書局，2002年、2010年；下文分別簡稱《集錄》和《集錄二》），書中材料的上限正好與《集成》銜接，下限到2007年。臺灣地區學者所編的《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藝文印書館，2006年；下文簡稱《器影》）也是與《集成》銜接，材料收集的下限在2005年。

上述幾書都是將散見的金文材料彙總，包括傳世和出土的。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三晉中出土材料中數量最大、價值極高的新鄭白廟范村窖藏戰國

晚期韓國兵器，至今沒有完全發表，只在《文物》1972年第10期的《簡報》公佈了30件上下的銘文，而窖藏的全部數量有180件左右，除了幾件以外，絕大多數都有銘文，期待能早日看到全部器銘的發表。也有一些文博單位和個人收藏家將藏品編成圖錄，如《河南博物院藏青銅器》（香港國際出版社，1999年）係在香港的一次展覽圖錄，由於白廟范村材料的主體均藏於該院，圖錄中公佈了其中從未發表的幾件器形，但沒有同時提供拓片和銘文照片，只有簡單的釋文，無法作進一步的研究。同樣的幾件兵器又收錄在《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青銅器》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文簡稱《文物典》）中，圖片質量足以辨識銘文，彌補了一大缺憾。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博物館收藏有四國的兵器，在出版的館藏圖錄中不時發現公佈的器物照片，筆者在文中已有引用，這裏暫時從略。

私人的圖錄首推《珍秦齋藏金·秦銅器篇》（澳門市政局，2005年；下文簡稱《珍秦》）、《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澳門基金會，2008年；下文簡稱《珍晉》）。《珍秦》收秦兵器十多件，《珍晉》收三晉兵器25件，其中較多罕見的珍品，並提供器形及細部放大照片、銘文拓片及摹本，無論從學術價值還是印刷質量來說，在私家編輯的圖錄中均屬於上上之作，李學勤先生已分別為兩本圖錄撰寫了“前言”；兩書的器物大部分已收進《集錄》與《集錄二》。2012年出版的《飛諾藏金》（中州古籍出版社）是最新的一部兵器圖錄，收四國兵器14件，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以上就是本文依據的主要材料範圍。

三、選題的意義

衆所周知，有關戰國史實的文獻材料由於兵燹、戰火和秦的焚毀而殘缺不全，《戰國策》和《史記》的有關記載常常混亂不清，同時又沒有像記載春秋時期的《左傳》那樣完整可信的編年史可以憑藉利用，因此清初學者顧炎武就曾發出過“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的感嘆。自從王國維先生倡導“二重證據法”以來，學者們紛紛運用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相印證，鉤稽古史，成績斐然。近幾十年來隨着考古發掘工作的大規模開展，出土的戰國文物可謂精彩紛呈，簡牘、璽印、古幣、陶文、石刻、銅兵器、銅容器等不可勝數。其中秦、三晉的兵器是一大宗（趙國兵器除去有偽刻嫌疑的差不多在80件上下；魏國有兵器50多件；韓國兵器以新鄭白廟范村窖藏出土近180件有銘兵器爲大宗，除去白廟范村出土的也有80餘件；秦兵器已過百），不僅數

量較大，而且其中的內涵非常豐富。銘文包括年數、鑄地、督造者、主造者和鑄造者的官稱與名字，以及置用地點、器物編號等信息，這些對於考察當時“物勒工名”制度，以及軍械鑄造、收藏、管理和流程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關涉戰國年代學、官制、地理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史料，就器物本身而言，又隱含禮制、器形、工藝等研究方向和內容。

前人多據古本《竹書紀年》來糾正《史記·六國年表》之誤，但《紀年》的時間截至魏安釐王時，其後雖有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可以參考，然而畢竟不是完整的年表，且關於六國的記錄也很少。就年代學而言，通過對四國兵器的考古類型學分析，將它們各自在器形上的先後演變次序排列出來，再結合器銘上的年數進行討論——如新鄭所出韓桓惠王與韓王安兩世較為完整的紀年兵器，趙國後期中央系統所造兵器——確定它們的年代，綜合排比，在編年上的價值就非常突出。三晉紀年兵器大部分造於戰國後期，隨着今後材料的不斷豐富，對於驗證戰國的後期年代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晉兵器銘文最完整的格式包括年數、督造者、主造者和鑄造者，督造者多是相邦、司寇和地方縣令，主造者一般是國都或各地武庫的工師，鑄造者為冶工，分別作為戰國時期上、中、下各階層的代表，據此可窺見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僚的運作，工官系統的設置以及下層技工的狀態。秦兵器銘文顯現出鑄造機構的複雜多樣，中央系統有少府、詔事、屬邦、寺工，各地還有工室，督造官員有相邦、內史、郡守，牽涉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

前人的研究對上述內容都有所涉獵，但將材料儘可能收集齊全並作綜合性探討的則不多見，本書希望通過系統的研究，將相關器物的探討及制度、史事的分析向前推進一步。

四、本書的思路

本書的研究將綜合運用多學科方法。首先是從器形出發，對秦、三晉紀年兵器進行考古類型學分析，分別考察它們各自的演變序列，為編年打下堅實的基礎。其次是文字的釋讀。由於銘刻人員多是下層技工，美觀已無從談起，銘文清晰都已屬難得，很多刻銘細如毫絲，無法墨拓，給釋讀帶來許多不便，加上不能目驗原器，有的文字只好闕疑。戰國文字的研究在近十幾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一些關鍵文字的釋出使得許多器物的銘文得以通讀，並且利用材料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王國維先生在其名文《桐鄉徐氏印譜序》中便提到“欲治壁中古文，不當繩之以殷周古文，而當於同時之兵器、陶

器、璽印、貨幣求之”。同樣，對於四國兵器銘文的研究而言，也必須參考其他幾類戰國文字考釋的最新成果，當然還包括王氏所未及見到的簡帛、鄂君啓節、侯馬盟書、中山王器和秦封泥等資料。再次，便是根據銘文內容來劃歸國屬，通過地名的考證大體能將兵器的國屬確定。古幣和陶文的研究是很好的參考，個別文字的寫法特徵也可作為依據之一，兵器自身的辭銘格式更是在分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各國地名或有重複，或歸屬有變，但在辭銘格式上卻涇渭分明，多方面的相互參證使分國的結論堅實可信。最後，在上述幾個方面都已經得到充分討論之後，結合相關器物，對有關問題進行考察，總結出四國兵器銘文在史料上的重要價值。

對於前人已經弄清的問題，本書就從略，把重點放在闡述新的思路和結論上。鄒逸麟先生在所著《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一書的初版後記中提到他著作的指導思想是“人詳我略，人略我詳”，筆者也希望本書能朝這個方向努力。

在探討秦、三晉兵器的過程中筆者撰寫了內容上有所關聯的幾篇小文，現在一併附於書後，以供參考。

第一章

兵器的考古類型學研究

第一節 《集成》兵器銘文獻疑

《殷周金文集成》是目前收羅先秦銅器銘文最豐富的著作，編輯者的辛勤勞動為學者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是應該表示感謝的。入選的器物都經過他們的審核，正如其“後記”所言，選拓過程中發現了不少問題，並擬將這些可疑器物的銘文另行編錄，希望能有機會見到此書的問世。在使用《集成》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一些有爭議的三晉紀年兵器也列在其中，因此在下面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希望有助於問題的澄清。至於在《集成》之後出版的金文著錄彙集，如《集錄》、《器影》、《集錄二》等，所收器物絕大多數為考古發掘出土，可以作為很好的參考。

《集成》收錄的器物有相當一部分是首次出現，另外一些銘文只有摹本存留，器體本身已經不知所終，筆者認為對於這些失去原物的摹本，即使覺得有問題，如果沒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只能暫且闕疑。因為摹本畢竟經過後人之手，無意的過失不可避免，若是將同一件器物的拓本和摹本相對照，經常發現其中有誤摹的地方，故在此提出這一點以供參考。

對於三晉兵器中的偽刻銘文，李學勤先生在《戰國題銘概述》中就指出要注意加以剔除^①，裘錫圭先生也認為傳世的王立事南行唐令鉞中不乏後人偽刻之作^②，吳振武先生則將《集成》中存疑的三晉兵器一一列出^③，這些意見都很有價值。

①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1959年第8期。

②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448頁。

③ 吳振武《趙十六年信平君鉞考》，《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文末注6、注9。吳振武《趙武襄君鉞考》，《文物》2000年第1期，文末注20、注25。

例如《集成》11684 鉞，“相邦”的“相”作, 第二個“邦”字中間多一豎變成, 其下“左”字也多一豎成, “冶”字刻成, 都與一般銘文不合。若上述還可以用劃痕來解釋,最後的形式就很難理解了,趙國器銘末尾一般刻有“執劑”兩字,少數沒有,但卻不見簡省成一個字的情況,此鉞辭末二字非常清晰,最尾一字是“劑”,其上卻非“執”,而是冶工的名字,這就暴露出作偽者的破綻,故此器銘文必是偽刻。同樣是春平侯督造的11558 矛,第二個“邦”字作, 左下有三橫,與一般只有兩橫相異。

《集成》11678 是八年相邦建信君鉞,“年”字作, 這種寫法的“年”字極為少見,類似的也只有11717 鉞、11315 戈和11316 戈,而這三件器都有偽刻的嫌疑,下文將會具體涉及。再看此器“信”字,與一般的寫法有相當的差異,所从的右旁頗為怪異,當是作偽者不明字形所致。《集成》11691 為十五年相邦春平侯鉞,“相”字作, 比普通的寫法少了下面的兩點,第一個“邦”字作, 與前面提到的11558 矛相同,而第二個“邦”字卻又規範地作, 令人十分費解。另外“伐”字作, 从, 而普通的寫法从, “器”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右旁的部分為, “口”已經刻成“日”,同樣是因為不明字形所致,“春”字作, 也比較罕見。還有11699 的十七年相邦春平侯鉞,單憑銘文中“春”字从从, 便有偽刻的嫌疑,更不用說“年”作, “伐”字前所未見地刻成, “器”字省簡成“爻”等讓人起疑之處。

守相廉頗督造的兵器中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如編號11700 的十五年守相鉞有“大工尹韓耑”字樣,位置與主要銘文同在一面,而這五個字在其他趙國兵器中一律都刻在主要銘文的背面,當是作偽者不明辭例所致。11717 的十八年相邦建信君鉞,“年”字如上文提到11678 鉞一樣作, “信”的寫法更是莫名其妙,的構形只能大體上分析為从, 其右半部分不識,“韓”字作也有別於常規字形。

在同類器物橫向對比時,從文字形體和辭銘格式兩方面可以發現不少問題,上面主要從字形方面考慮。還有一些偽刻的兵器單純從文字上看無法挑出紕漏,因為作偽者照抄真器的銘文,刻工幾能亂假成真,但在內容上不免張冠李戴,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下面三器:

王立事南行唐令瞿卯左庫工師司馬郃冶得執劑

(《集成》11673 鉞,即《錄遺》599)

王立事南行唐令瞿卯右庫工師司馬郃冶得執劑

（《集成》11674 鉞，即《周金》6.91.2）

十八年相邦建信君邦右庫工師司馬郃冶得𠄎執劑，大攻尹韓崙

（《集成》11717 鉞）

裘錫圭先生在考證“南行唐”幣文時引《周金》這件銘文，並在注中指出仿此銘文的偽器很多，“《錄遺》599 一鉞，‘衛’無重文號，‘右庫’作‘左庫’，亦可疑”^①。黃盛璋先生在《試論三晉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則以《錄遺》599 鉞為例^②，認為其他同銘的偽器即仿刻此鉞，十八年建信君鉞乃混合建信君鉞銘和《錄遺》599 鉞銘而成。兩位的懷疑都是正確的，由十八年相邦平國君鉞已經可以斷定此鉞銘文是偽刻，再對照上面三器的銘文，可以清楚地看到從“庫”字開始，三器的銘文基本一致，連“司馬”不作合文也如出一轍。只不過 11673 鉞是“左庫”，11674 鉞是“右庫”，11717 上文已經從文字方面懷疑其是偽刻，如今再加對照，可知此器其實乃雜揉建信君鉞和 11674 鉞的銘文。

再看兩件王立事鉞銘，只有兩種可能性：或者其中一件仿刻另一件銘文，或者兩鉞銘文都是偽刻，兩件都是真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為同一個工師在兩個庫中主造兵器的情況在三晉器銘中沒有先例，春平侯和建信君二人督造的兵器幾乎佔趙國兵器總數的一半，其工師與庫的關係都是一一對應的，如工師“吳疵”分別見於元年建信君鉞、十八年平國君鉞和武襄君鉞，其前都冠以“右庫”或“右伐器”，吳振武先生釋“右伐器”為“右庫”或“右庫冶器”之意，“伐”不是“攻伐”的意思，而是當“攻治”講^③，其說是也。因此可以排除兩鉞器銘同時為真的可能性，那至少有一件是偽刻，從辭銘格式看二者並無差別，以文字來看，11674 鉞銘已經漫漶不清，《集成》所採用的也只是《周金文存》的摹本，故而暫且不論。11673 鉞銘文開頭的“王”字作，右下邊多出一點，左邊似乎也有一點，不像是“王”字，倒是和漢印中的“玉”字非常相似^④，故 11673 鉞確實有偽刻嫌疑。王立事南行唐令鉞傳世者非常多，學者研究的結論是：“傳世銅鉞每仿刻此一銘文，如《痴盒藏

①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 年，448 頁。

② 黃盛璋《試論三晉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74 年第 1 期；收入氏著《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齊魯書社，1982 年。下文引用黃先生此篇的觀點，簡稱《三晉兵器》。

③ 吳振武《趙鉞銘文“伐器”解》，《訓詁論叢》第 3 輯，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1997 年。

④ 袁日省等《漢印分韻合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79 年。

金》六八等。《錄遺》五九九改‘右’爲‘左’，《周金文存》卷六補遺一鉞於‘王’字上加‘匚’字，皆屬僞刻。實則這些僞品字形多誤，形制也多不合，須加分辨。”^①這是從銘文和類型學上提出的質疑，實際已將所有傳世的王立事南行唐令鉞都否定，綜合銘文字體和辭銘格式看，這些意見值得重視。

其他如《集成》11652和《集成》11653的兩件廿九年高都劍，前者《集成》在備注中提到“王國維曾疑僞”，後者黃盛璋先生在《三晉兵器》一文中也認爲可疑。附帶說一下，《集成》11380的五年呂不韋戈，即《小校》10.58，目前所見的呂不韋諸器都是長胡四穿，而此戈卻爲三穿，且銘文刻得非常模糊，故李學勤先生認爲很有僞刻的嫌疑。

或有學者對《集成》11269十四年□州戈的銘文行款表示懷疑^②，實際上在胡部倒刻銘文的不乏其例，如秦十三年大良造鞅戟（《集成》11279）的銘文便有一面是從胡部向援部而行。十三年大良造鞅戟是目前所知秦最早的紀年兵器，或許這種不合常規的做法有特殊的緣故。

有些無法目驗原器，即使覺得可疑也不敢妄下結論，而《集成》許多器物只印出有銘文的部分，《〈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和新版的八卷本《殷周金文集成》在這方面沒有多大的改觀，其實有些時候形制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銘文。李學勤先生就根據器形等因素質疑現藏國博的兩件紀年銅匕首（《集成》11657、11672）^③。近十年來新出版的《集錄》、《器影》和《集錄二》也都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收錄銘文時儘可能將器形也一起印出，甚至還提供器表的紋飾拓片，極大地方便了學者的研究。

下面是可疑器銘的彙總（表1-1）。

表1-1 可疑器銘列表

器 名	器 銘	著 錄	懷疑者
王立事南 行唐鉞	王立事南行唐令瞿卯右庫工師司馬 郃冶得執劑	《集成》11674	李學勤、黃盛璋
王立事南 行唐鉞	王立事南行唐令瞿卯左庫工師司馬 郃冶得執劑	《集成》11673	李學勤、裘錫圭

① 李學勤、鄭紹宗《論河北近年出土的戰國有銘青銅器》，《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中華書局，1982年，文末注13。

② 朱力偉《先秦古兵雜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

③ 李學勤《〈珍秦齋藏金·吳越三晉篇〉前言》，載《珍晉》。